

六十年來之蘇俄外交（上）

畢英賢

前言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俄曆十月二十五日）俄共在所謂「十月革命」中奪得政權，至今已屆六十年。一九一七年底共產黨徒統治俄國之初，外患內亂交迫，它終於渡過了難關，部份是由於若干不可預知的幸運因素。列寧之所以奪得政權是偶然的；當時俄國國內外的反共力量未能協調一致，致使俄共政權未曾夭折，也是偶然的；在第二次大戰之前史達林對局勢之評估犯錯累累，終因邱吉爾接納其為盟友和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俄共政權不但逃過毀滅厄運，而且成為勝利者與獲利者，更是偶然的。

當然，把蘇俄政權初期能以渡過難關完全歸功於運氣，和完全歸功於其領導者同樣可笑。肯南（George Kennan）在判斷蘇聯外交成功的因素時所下的定論是：蘇俄的應變才能與對目的專心一志佔三分之一；西方國家的業餘態度，得意自滿與不團結佔三分之二①。

從俄共政權成立之時起，共產主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而是具有擴張性的政治力量；國際政治就開始受其影響。今天，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在制訂對外政策或國內政策時，皆不能忽視蘇俄對外政策這個因素。

在考慮這個因素對個別國家可能的影響之前，必須瞭解什麼是蘇俄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為了解答這些以及其他有關的問題，對蘇俄過去六十年中的對外政策作一重點式的敘述，是有幫助的。

蘇俄對外政策本質

關於什麼是蘇俄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這個問題，至今難以找到滿意的答案。它是執行馬克斯列寧主義所提倡的「世界革命」？還

註① 喬治·肯南，「列寧與史達林之下的俄羅斯與西方」（波斯頓，一九六一），第三三三頁。

是作爲一個世俗的「民族國家」而追求「國家利益」？對前一個說法，可以引述繁多的蘇俄官方文件予以支持。從早期列寧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迫人民」的呼籲，乃至於俄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七六）所發表的文件，不一而足。此外，俄共與各國共黨（親毛派除外）保持密切聯繫也足可證明俄共仍在推行世界革命。但是，很多事實又證明，蘇俄以追求國家利益爲重。茲舉重大例證如下：一九一八年與德國停戰而簽訂之布里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條約，一九三九年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九六二年在古巴危機中撤退，一九六八年進犯另一個共產國家——捷克以阻止其偏離共產主義的自由化。在這些事件中，俄共領導者皆曾在國家利益與世界革命要求兩者之間作一選擇，而所作的抉擇皆偏向國家利益^②。雖然邱吉爾曾說，蘇俄的對外政策是一個謎中謎；但是，他還說過，有一個鑰匙可以揭開這個謎中謎，那就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③。

基於上述現象，有關蘇俄對外政策本質的看法至少可以歸納爲三類。第一類是傳統派，他們認爲，蘇俄對外政策乃是沙皇俄國傳統目標的延續，其中心是「國家利益」，其特點是向外擴張；而「不斷擴張」是俄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常數。第二類是意識形態派，他們在蘇俄對外政策中見到了俄共建立世界共產主義與控制世界的藍圖，其中心是「世界革命」，其特點是消滅資本主義。第三類可名之爲折衷派，他們對蘇俄對外政策的解釋介乎前兩派的中間，且認爲在其政策形成中有幾個不變因素：即俄國的地理位置，尋求戰略上安全邊界的俄羅斯擴張主義，與根深蒂固的俄羅斯救世主義相互融合的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以及外來的挑戰性衝擊。

然而，如欲在「國家利益」和「世界革命」兩者之間確定一個比例，誠非易事。毫無疑問，自列寧以來的蘇俄領袖皆以忠實的馬克斯主義者自居，對「共產主義大業」從未等閒視之；另一方面，蘇俄的政策莫不以保衛與增進蘇俄國家安全與利益爲主要着眼點。俄共却把兩者巧妙地、辯證地結合起來，把蘇俄描繪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領導力量，因此保衛蘇俄的利益就是保衛世界革命的利益。事實上，依照歷史的紀錄，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與組織通常是爲蘇俄的國家利益效勞^④。

總括說來，世界革命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在俄共政權成立之初比較強烈，隨着時間的轉移，其強度逐漸減弱。至今，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顯示，俄共領導會爲了革命運動而不顧國家利益^⑤。

蘇俄的外交行爲也發生了變化。列寧曾說，「政治上的誠實是強有力的結果，假冒偽善是衰弱的結果」^⑥。過去，蘇俄的外交行爲經常表現出口是心非、虛假背信、瞞騙欺詐、強詞奪理以及其他更加不誠實的作風。史達林死後，蘇俄國勢漸強，其外交行爲

註② 塔瑞爾·韓馬 (Darrel P. Hammer)，「蘇聯：寡頭政治」(Hinsdal,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1974)，第三八八頁。

註③ 邱吉爾 (Winston S. Churchill)「聚集的風暴」(The Gathering Storm) (波斯頓，一九四八)，第四四九頁。

註④ 康貝爾 (John C. Campbell)，「在國際環境中的蘇聯」，戴卡索夫 (Allen Kassov) 編「對蘇維埃社會的展望」第三版 (Prospects for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第四三三—四七四頁。

註⑤ 韓馬，「蘇聯：寡頭政治」，第三八六頁。

註⑥ 列寧，「全集」(Sochineniya)，第十七卷第一三八頁，在「政治評論」(Politicheskie Zametki)一文內。

也逐漸捨棄過去的假冒偽善與瞞騙欺詐等伎倆，而傾向於坦率的姿態^⑦。如今，國際上的軍事、政治與心理力量的對比仍在變，且由於姑息主義的影響，似乎在向共產集團有利的方向變，於是，蘇俄的外交也大異往昔，其特點之一乃是更加憑藉自身實力，在外交事務上的態度亦更加蠻橫。

蘇俄的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中有三件大事：「十月革命」，戰勝納粹德國、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即共產集團）的形成；因此他們將蘇俄對外關係史分為：「十月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戰中，與戰後三個時期^⑧。不過西方學者對分期的主張，頗不一致，故本文不作嚴格劃分，僅就各時期之特徵分節敘述。

形成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

在這個時期內，布爾什維克政權面臨四個主要問題：和平問題、內戰問題、外國干預問題、革命輸出問題。

俄共從沙皇繼承過來的俄羅斯，困難重重，軍隊組織鬆弛，士氣低落，人民飽受災難、厭惡戰爭，社會秩序瀕於崩潰，對德戰爭未曾停止。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使俄國退出戰爭為當務之急。所以列寧說：「十月革命一開始，我們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乃是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問題^⑨。」同時，「和平」原是俄共奪權的主要口號之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蘇俄政府頒布「和平法令」，向各「交戰人民與政府」建議，立刻開始談判以求達到「公正與民主的和平」，不割地不賠款；並宣佈將取銷秘密外交和公佈沙皇俄國與外國所簽訂的祕密條約。這使協約國擔心，這也導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宣言，表明協約國的戰爭目的^⑩。

十二月三日蘇俄與德、奧匈等國開始談判。德國期望和約儘早達成，以便把主力調往西戰場。談判之初，蘇俄使用拖延戰術，致使德國不耐，遂定下割地條件，要求即刻答覆。於是，蘇俄共黨領導階層因對外政策發生首次大辯論。列寧主張立即終止與德國的對敵狀態，以維護俄國革命；托洛茨基主張拒絕德國要求，不簽約求和；「左派共產黨」徒認為應對德國發動「神聖戰爭」。俄共中央在折衷各派意見後同意採用托洛茨基的原則：「不戰不和」，以圖拖延時間，進而激起德國內部「無產階級革命」。當時俄共黨徒大多相信，一旦歐洲其他國家尤其在德國也發生相同性質的革命，則俄國革命便不致短命。但是，德軍堅持要求立刻解決和戰問題，繼而大舉進攻，指向彼得堡，不僅旨在侵佔更多的領土，且有推翻俄共政權的意圖。此時，俄共大起恐慌，試向英法尋求「馬鈴薯與武器」未果，面對德軍威脅，祇好同意簽訂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條約，使俄國獲得了「恥辱的和平

註⑦ 亞斯帕士里昂（Vernon V. Aspaturian），「蘇聯對外政策之過程與權力」（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1），第三五〇頁。

註⑧ 特魯汗諾夫斯基（V. G. Trukhanovskii）主編，「國際關係與蘇聯對外政策史」（共三卷）（莫斯科：國際關係出版社，一九六七），第一卷第二六一—二一七頁。

註⑨ 列寧，「全集」（俄文），第三十七卷第一一五頁。

註⑩ 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布爾什維克革命，一九一七—一九二三」（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3），第三卷第十三頁。

」。依照這個條約，俄國把廣大的西部領土，包括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各省割讓給德國，且必須使俄軍復員。但在協約國擊敗德國之後，俄共便片面撕毀這個條約。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事件對俄共邇後的對外政策，影響深遠，使他們體會到：軍事上的軟弱易招致外來的攻擊；不可依賴世界革命以鞏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世界儘管內部有矛盾，仍將不斷努力以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雖然祇有世界革命才能確保俄國國家的安全，但是俄共政權的生存也是世界革命最後成功的先決條件^①。

「十月革命」後，俄國在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之間，發生了內戰，分東線、南線、北線和西北線進行。前兩戰場較後二者重要。反共武力稱「白衛軍」簡稱「白軍」或「白黨」，因缺乏統一理想和共同目標、缺乏組織和不善運用羣衆，又缺乏中心人物而不能統一行動，終爲紅軍所敗。

內戰期間，協約國站在白軍方面，以期恢復東戰場對抗德國；大戰結束後，協約國惟恐布爾什維克主義蔓延歐洲，故未曾終止軍事干預。軍事干預國包括英、法、美、日（前兩者爲原始協約國，後兩者事實上參與）等十四個國家。軍事干預地區主要在俄國的北方穆爾曼斯克（Murmansk）和阿爾汗格爾斯克（Arkhangelsk），以及遠東地區。一九一八年三月初第一批英國軍隊（兩百人）在穆爾曼斯克登陸，中旬法國兩艘巡洋艦先後到達這個港市，然後軍隊登陸，且帶有裝甲列車，由穆市沿鐵道南下巡邏。不久發生捷克兵團事件，協約國遂乘機擴大干預。

捷克兵團成立於「十月革命」之前，其成員皆係奧匈陸軍中的軍人，被俘或逃亡到俄國，共約五萬人，甚願對德作戰並爭取捷克斯拉伐克的獨立。俄國臨時政府曾答應設法把該兵團運送至西戰場，布爾什維克當政後，深恐該兵團爲協約國所利用，遂使其經由海參崴迂迴返捷克。但捷克兵團對布爾什維克心懷戒懼，不肯繳械，且於一九一八年六月間，佔據西伯利亞大鐵道若干線段，成爲俄境反共運動的主流，其活動地區從伏爾加至東西伯利亞。六月底，英國在穆爾曼斯克增兵，並聯合法國在阿爾汗格爾斯克登陸。在遠東方面，日本軍隊已以「日人被殺」爲藉口，於四月初登陸海參崴，美國軍隊亦相繼登陸。六月底捷克兵團推翻海參崴共黨政府，美、日軍隊續增；八月英法亦派兵登陸海參崴。至此，外國干預軍隊聲勢漸大與內戰相呼應。

自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紅軍在愛國主義號召下，接受指揮統一，漸佔優勢，白軍逐漸失利；同時在白軍的反共鬥爭中，興起了俄國邊陲地區的強烈地方主義和分裂主義運動，也出現了衆多的獨立政府，終使外國干預者對復辟舊俄的興趣，大爲降低，所派軍隊，亦無功而返。

一九一九年中，匈牙利與德國先後發生革命（皆未成功），法國社會動盪不安，布爾什維克爲了加速世界革命的發展，於是

註① 同前註，第五十七頁。

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年底，列寧在全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⑫，協約國干預行動已被遏阻，內戰危險期已過。一九二〇年七月，召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此時該國際已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這次會議後，克里姆林宮更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代言人與決策者。不過會後不久，波蘭人民起而抗拒紅軍，但未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於是俄人對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發生革命的希望，趨於幻滅。年底，內戰結束，外來干預也告完全失敗。於是列寧對蘇俄的對外政策作出提示^⑬，他重申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最後勝利不可避免，但是必須在一段時期內與資本主義世界共處，重整黨組織與發展經濟。可以說，此後蘇俄對外政策的重點在維護俄共政權、改善國際地位，增進共產主義影響與力量。

恢復與過渡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三三年)

在這十二年中，蘇俄對外關係逐漸形成；從一九二一年三月英國與它訂立貿易協定等於事實上承認其政權起，至一九三三年底美國與它成立正式外交關係止，幾乎所有主要國家皆正式承認了蘇俄政府並建立了貿易關係。蘇俄終於打破外交孤立，躋身於國際社會，但是並沒有放棄其世界革命的目標。

一九二二年對蘇俄各方面而言是一個分水嶺。此時內戰剛結束，國內經濟瀕臨崩潰，「世界革命」轉入低潮。蘇俄主要對外政策方針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政治與經濟關係」^⑭，國內政策的重點則是加強實力以應付不可知的未來。爲了加速經濟恢復與發展，俄共決定推行「新經濟政策」、歡迎外資、廣訂商約。在外交運用上，則是防止資本主義國家聯合一致對蘇俄發動另一次干預行動推翻俄共政權。因此打破外交的孤立是這段時期內蘇俄外交的首要目標，推行這種對外政策的重點則在西歐與遠東，且以德國與中國尤其重要。

蘇俄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與德簽訂貿易協定，接着祕密討論軍事合作問題，德欲規避凡爾賽和約(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限制而在蘇俄訓練軍事人員與發展軍事技術，蘇俄則欲藉德國專家之助以建立其軍事與工業力量。一九二二年四月，蘇俄應邀參加熱拿亞(Genoa)國際經濟會議，會中西方各國要求蘇俄政府清償舊俄一切外債，蘇俄提出反提案，要求西方國家賠償其封鎖與干涉蘇俄所造成的損失，其總額爲外債的一倍。因此，熱拿亞會議不歡而散。但俄德却在會外簽訂了「拉巴羅條約」(The Treaty of Rapallo)，這是俄德日後經濟與軍事密切合作之始，也是蘇俄首次的外交勝利。「拉巴羅條約」不僅結束了蘇俄的外交孤立形勢。

註⑫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八五——一九七頁。

註⑬ 列寧，「在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載「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一四——四二七頁；「對外貿易讓步」，載「全集」(俄文第

二版)第二十六卷五——十四頁。

註⑭ 「大蘇聯百科全書」(一九五一年版)見「蘇聯對外政策」條。

確保其安全與免遭西方聯合攻擊之虞，而且獲得了經濟與軍事利益。一九二五年十月俄德復訂商約，該條約成爲日後蘇俄與「資本主義」陣營簽訂條約的藍本。同月，法、英、德簽訂「羅加諾條約」(The Locarno Treaty)，於是德國對外關係隨之轉變，與西方與蘇俄同時保持友好關係。德國爲使蘇俄安心，又於次年四月與之締結柏林條約。

對西歐其他國家，蘇俄的外交政策目標在求恢復邦交。此種努力至一九二四年時已見成效，這一年英國予蘇俄政府以法律上的承認，法、義等國亦採取相同措施。美國因蘇俄不承認國際義務的神聖性，雖然在經濟上與蘇俄發生關係，遲至一九三三年始予以法律上的承認。在東歐方面，一九二九年二月，蘇俄與波蘭、愛沙尼亞、羅馬尼亞及拉脫維亞等簽訂「莫斯科議定書」，這使東歐不致爲西方國家用作侵略蘇俄的基地，但是並未使蘇俄在此地區的影嚮增大。在中近東方面，蘇俄的外交目標在鞏固西南及南部邊陲，一九二一年與波斯訂新約，放棄特權。一九二五年與土耳其成立協定，加強兩國邦交；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西方國家爲謀孤立蘇俄，曾與土耳其召開洛桑會議，通過開放博斯普魯斯及達達尼爾海峽，對蘇俄很不利。但嗣後蘇俄參加了該會議並在協定上簽字，因而獲得更多國家的承認。

蘇俄在遠東的早期目標是收復日本所佔領的西伯利亞部分地區。一九二二年在美國的壓力下，日軍完全撤出西伯利亞；在此以前，蘇俄對遠東尚未懷有意識形態與軍事目的。西伯利亞問題解決後，外交箭頭轉向中國。

一九一八年蘇俄外長齊采林發表「放棄對華特權之聲明」；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副外長加拉罕分別發表兩次對華友好宣言，聲明放棄不平等條約及治外法權等，在中國知識分子與學生間引起極大同情。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代表胡汀斯基來華，次年協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紅軍進入外蒙，成立「外蒙獨立政府」。因此，一九二二年時蘇俄的進入中國之路業已鋪妥。

一九二二年夏，蘇俄派越飛來華，與北京政府談判未果，次年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發表「共同聲明」謂蘇俄共產制度不適用於中國，越飛並保證蘇俄將提供支援。接着，加拉罕來華幾經波折，終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與北京政府成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簡稱中俄協定)；此時東北爲張作霖盤據，他反對中俄協定；於是加拉罕派其祕書與張訂立「奉俄協定」，後被併入中俄協定。中俄協定除恢復兩國關係外，尚規定蘇俄撤退駐外蒙軍隊，承認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并承認中國有處理中東鐵道之權等。中俄關係的恢復是蘇俄在遠東的主要外交勝利。

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南方的國民黨代表着中國的未來，蘇俄自然也要加以聯絡的。第三國際在一九二二年已開始命令中共個別加入國民黨，其後國共正式合作，共黨盡力在國民黨內迅速發展，及至國民革命軍北伐，俄國顧問鮑羅廷乘機施展分化手段，組織了武漢聯合政府，造成寧漢分裂；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年底蘇俄與國民政府斷絕關係。一九二九年發生「中東路事件」，俄國惱羞成怒宣佈正式與中國絕交。

在另一方面，俄英關係亦趨決裂。事緣蘇俄在英機構密謀反英，遂致兩國於一九二七年斷絕了外交和商務關係。

蘇俄鑒於在英國與中國方面的外交挫敗，於是尋求新途徑以確保其安全。除在國內加強發展「一國社會主義」外，同時促使共產國際採取強硬路線，把保衛蘇俄列為「國際無產階級」的主要責任^⑤。就在此時，蘇俄與東歐訂立非戰公約，一九三二年復與法訂非戰條約，宣稱放棄以戰爭為推行國策的手段。這些條約祇是製造了改善關係的假象，不含有集體安全的功能。在這個時期內，蘇俄高唱和平政策；雖非國際聯盟成員，但經常參加國聯所支持的幾個委員會，努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尤其在裁軍問題上，屢提建議，但因其建議近於空想不易實行，未被採納。一九三一年以後的幾年中，蘇俄因不能與美、英、法擴大貿易或取得貸款，逐漸傾向德國。但是，發生了兩件大事，迫使蘇俄領導不得不重新擬定其對外政策。這兩件事，一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一是德國希特勒的崛起，尤其後者直接威脅到蘇俄的存在。一九三三年末，蘇俄開始認清德國政策的趨向，并試探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結果與義大利訂友好條約，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與法國的關係也獲得改善。可以說，日本在亞洲的擴張與希特勒的反俄態度，迫使蘇俄投向西，追求集體安全。

追求安全時期（一九三四——一九四一年）

這一時期內，從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蘇俄面臨西方德國與東方日本擴張主義的威脅，其對外政策重點在追求和加強集體安全。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蘇俄懷疑西方國家故意促使德國向東擴張，因而謀與德國共存；然而，德蘇戰爭終不可免。

一九三四年九月蘇俄加入國聯，使其對外政策發生了轉變，企圖以集體安全體系對付德國的威脅。因此在往後的幾年內，蘇俄積極強調并努力促成國聯的團結一致。西德的退出國聯（一九三三年）及其對蘇俄毫不隱瞞的敵意，加速了蘇俄對西方的正常化；希特勒向波蘭的示好，更加深了蘇俄的恐懼。於是蘇俄與法國於一九三五年五月訂互助條約，接着與捷克簽訂相似條約；相約一方在遭受侵略時，另一方將赴援。但在俄捷條約中有一特別規定，即捷克遭受侵略時，如法國赴援，蘇俄政府才能援助捷克；這一規定與後來捷克的悲劇有關。

另一方面，蘇俄的加入國聯，表示其願意遵守國際政治規範，因此在「共產國際」的政策上也必須有所更張。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共產國際」的第七次大會上，季米特羅夫提出了與西方聯盟對付法西斯侵略的新策略，即所謂「人民陣線」，但是他強調共產黨在各個「人民陣線」內仍應保持共黨素質^⑥。不久，人民陣線政策與集體安全體系皆受到了國際政治的嚴酷考驗。

一九三五年十月，義大利入侵衣索匹亞，國聯對侵略者束手無策。次年三月，希特勒長驅侵入萊茵地區，違反了「羅加諾條約

^⑤ 「共產國際綱領」，「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台北，民國五十八年），第二集第五十五頁。

^⑥ 季米特羅夫（G. Dimitroff），「法西斯的攻擊與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抵抗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任務」，載「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文獻，（英文版，莫斯科——一九三九），第一四二——一四六頁。

「，法國未能採取行動，雖然英國與波蘭願意予法支援。希特勒獲得意外勝利，不僅使他的權力鞏固，而且也使德國登上戰爭與征服之途。這些事實使俄國對集體安全體系的功能不得不重新估計；並且考慮再與納粹德國締結「拉巴羅式」的條約。

另一方面，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加速了「人民陣線」的解體。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人民陣線黨」在選舉中獲勝，組織政府，佛朗哥將軍起而反對；西方民主國家相約不干涉，但德、義却支援佛朗哥。史達林因而暗中採取措施維護人民陣線，西班牙共產黨飛機培植勢力，消除異己，遂使西方對蘇俄的信任大減。

一九三六年十月「羅馬——柏林軸心」形成，不久德國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十一月，義大利加入「防共協定」。三國「防共協定」不僅是政治思想同盟，而且是軍事同盟。使蘇俄面臨着東西兩方面的威脅。

在一九二五——三一年間，蘇俄與日本雖然在中國東北爭奪勢力，及因日本人在北太平洋捕漁權發生爭執，畢竟還維持着一般的友誼關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之後，兩國關係逐漸惡化，蘇俄安全面臨新的挑戰。起初，它在中日間雖採取中立政策與觀望態度；但已理解到日本在中國的行動是攻擊蘇俄與全中國的前奏^①。中俄外交關係於一九二七年中斷，一九二九年因中東路之爭格外惡化，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時轉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恢復。當「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蘇俄鑒於國聯軟弱、西方國家姑息、以及自身戰略孤立，於是試圖與日本直接謀求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經過兩年斷斷續續的談判，蘇俄終於不顧中國的抗議而同意把中東路的一切利益售予日本，另并不斷加強黑龍江一帶及外蒙的軍事力量。

姑息未能滿足日本擴張主義貪得無厭的胃口。不久，日軍進入內蒙古企圖建立另一傀儡政權，因而直接威脅蘇俄在外蒙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三月，蘇俄不顧中國主權竟與外蒙簽訂條約，進而把其勢力伸入新疆省。同時，日蘇關係繼續惡化，雙方皆為最後考驗作準備。

一九三六年以後，國共再度合作，符合蘇俄遠東邊界安全的願望。同時，中共藉此在中國西北獲得喘息機會，擴張勢力，為日後叛亂作準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展開對中國的全面侵略，蘇俄與中國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給予中國軍援與貸款。中國向國聯控訴日本侵略行爲，毫無結果；這給予蘇俄的集體安全概念以另一次重大打擊。後來，慕尼黑事件發生，蘇俄迷夢初醒，轉而與德勾結。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日本與蘇俄先後發生了張高峯和諾門坎事件，使日蘇關係益形緊張，加強了蘇俄與納粹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決心。

一九三八年初，希特勒的侵略陰影，籠罩國際，佔領奧地利後，箭頭轉向捷克，旨在合併蘇台德區。英法政府雖生警覺，但仍

註① 特魯汗諾夫斯基主編，「國際關係與蘇聯對外政策史」，第一卷第二七八頁。

未改變其綏靖政策，反而迫使捷克將蘇台德割讓給德國。同年九月，英、法、德、義四國會議在慕尼黑召開，但無捷克在內，強判捷克撤出蘇台德，這就是近代國際關係史上臭名昭彰的慕尼黑協定。從此，德國氣焰高漲。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佔領全捷克，法國未採取行動，俄國袖手旁觀。至此，英法等國方醒悟，德國野心無法遏阻，開始組織共同抵抗。

一九三九年五月蘇外長李維諾夫去職，莫洛夫接任。這一舉措標誌了蘇俄放棄集體安全的努力，不再依靠國聯；而開始積極與德國謀求協議。蘇俄此刻仍懷疑西方民主國家，故意誘使德國向東擴張，藉希特勒之力消滅蘇俄。八、九月間，國際環境中發生了重要變化。英、法、蘇軍事談判陷於絕境，即使簽訂一種互助公約也不可能。於是，蘇俄接受了德國的建議，為改善德蘇經濟關係簽訂了「德蘇商約」（八月十九日），並進一步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八月二十三日）。這一條約無異為德國進侵波蘭亮出綠燈。另有密約協訂規定德蘇瓜分波蘭，並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芬蘭及比薩拉比亞置於蘇俄勢力範圍之內，立陶宛給予德國。

九月一日，納粹軍隊開進波蘭，英法對德宣戰，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對莫斯科而言，這是一個帝國主義戰爭。在俄共的觀念中，國際戰爭與和平不是兩個一百八十度相互對立與相互排斥的現象，而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向共產主義革命目標推進的階段。隨着戰爭的爆發，蘇俄放棄其政權成立以來所執行的不侵略、不擴張領土的政策，而在國家安全的掩護下為所欲為。九月二十八日，與德國秘密協議正式分裂波蘭，並把立陶宛大部分領土轉入蘇俄勢力範圍，蘇俄則同意把蘇波界線東移^⑤。史達林毫不猶疑地向波羅的海擴張，先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簽訂互助公約，繼而派紅軍進駐三國，終而合併於「蘇聯」。芬蘭雖然力抗蘇軍，但終於投降，讓出了卡累利阿地峽及維堡灣全境，並將漢哥半島租與蘇俄，因此成立了「蘇聯」境內的另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即卡累利芬蘭共和國。結果，「蘇聯」由十一個加盟共和國增加到十六個。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訪歐歸來，道經莫斯科，締結「日蘇中立協定」，此時納粹德國正向巴爾幹侵略，蘇德關係已到微妙階段。希特勒已經決心進攻蘇俄，但準備未週決不稍露聲色。蘇俄方面雖然沒有估計到希特勒在何時對蘇進攻，但大體預見早晚有此一着，所以在軍事與外交上同時預作準備。在外交上，其努力方向在孤立德國，例如：蘇俄首先斥責保加利亞加入軸心同盟；保證土耳其中立；在南斯拉夫政變中，公開支持反軸心的新政府；最後是和日本締結中立協定，使德國在進攻蘇俄時，失去日本的配合和援助。

「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雖然引起了若干人士的駭異驚呼，但也表現了蘇俄外交靈活狡黠的一面。

註⑤ 貝羅夫 (Max Beloff), 「蘇俄對外政策, 一九三六—四一年」(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第一卷第一八四頁。